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 何中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其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首次提出，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要求，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具有重大理论创新意义。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相遇”，绝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有其深邃的原因，是由更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同中国“水土”相结合，最终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相遇”，绝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有其深邃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不可能诞生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不可能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向前推进其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就不能不面临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应该说，在这方面，我们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可供总结并借鉴。

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充分地证明了这一论断。但从深层次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选择的结果。换言之，一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从另一方面看，同时也是一部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外来学说的接受史。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思考人类历史，是以“世界历史”为对象的，它并不仅仅局限于西欧各国，而是涵盖东方包括中国。可以说，马克思有一个“全球史”观的宏阔视野。更深刻的在于，唯物史观认为，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溢出”了狭隘的国家范围，外化为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奴役关系。“世界历史”的崛起，使革命的重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这正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诉求何以提出的特定历史语境，也是中国之所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历史缘由。

中国革命的实践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西方各式各样的学说和理论在五卅时期都曾传入中国，在中国的思想舞台上竞相登场，但最后只有马克思主义胜出，这绝不是偶然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指明了中国革命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而且“接地气”，是一种能够在实践层面上进入“上手状态”的学说。1920年11月，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曾说：“兄弟对于中国改良的方法，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开发中国财富，以为现代时应该从教育入手，应该从平民教育入手，把平民知识增高。到那个时候，再采用社会主义。”说白了就是“教育救国”。对此，毛泽东当时在蔡和森的信中谈到罗素主张时批评说：“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为‘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马克思主义恰恰没有这种局限性，因为它追求‘理论的彻底性’，而这种彻底性在马克思那里，就表现为‘实践能力的明证’。这一‘明证’首先在俄国‘十月革命’那里得到了表达。这无疑构成中国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契机。

恩格斯曾说过：“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所谓“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也就是基本的国情；而这些“条件”又必然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毋宁说它就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孕育而成的。尽管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具有指导作用，但倘若离开了对于中国国情及其文化背景的正视和尊重，这种作用就不可能发挥出来。邓小平曾指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走自己的路，也就是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因为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所特有的国情，既决定了我们必须选择马克思主义，也决定了我们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忽视了本国国情和中国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即使来到中国，也会水土不服，很难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毛泽东当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问题在于，中国国情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独特性，除了特殊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之外，还是由更深层的文化所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首先是实践选择的结果，但它的背后还是文化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和因子激活了，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勃勃生机，充满活力；同时，马克思主义经过“中国话”的诠释和发挥，实现本土化和民族化，成为融入中国实践的“活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倘若不经过“中国化”的过程和工夫，就不可能真正地来到中国，变成扎根中国土壤并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的“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语）。毛泽东当年肯定这个“活的马克思主义”，反对并拒绝那种“死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脱离中国国情，没有内在地融入中国文化和中国实践的、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活的马克思主义”，是立足于中国大地和土壤解读出来的，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中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这里的“中国性”怎样才能得以体现出来呢？它归根到底有赖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地继承。

毛泽东曾强调说，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恰当的态度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与此相反，“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使中国革命和建设深受其害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特别注重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民族形式，例如他尖锐地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说到底，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说汉语’

“讲中国话”，这显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民族形式”，不仅仅是指外在的形式，更深刻的是指内在形式，它本身就经触及内容本身了。离开了对于炎黄子孙所分享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遗产的继承和弘扬，“民族形式”将会失去着落，就只能剩下空洞的、抽象的外观。正是民族形式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了我们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与中国及中国性无涉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

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经过马克思主义的“中介”，从而得以辩证地“扬弃”，亦即毛泽东所说的“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融合，正是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得以展开的过程。在这个方面，可以说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例如，毛泽东的重要哲学著作《实践论》就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作为副标题，其中“知和行的关系”显然是中国本土化的措辞，它被用来诠释或翻译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还有，对于唯物辩证法所谓的对立统一规律，毛泽东通常也用“矛盾”或“一分为二”等中国式的措辞来概括和表述。这些无疑都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唯其如此，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下根，并开花结果。这个过程，实质上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过程。

再比如，毛泽东对《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所谓的“实事求是”，作了创造性的解释，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内部的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一经马克思主义内涵的赋予，“实事求是”的原有意义便得到了真正的升华，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立场的中国式表述。其结果是：一方面使中国古典文化现代化了，另一方面也使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了。“实事求是”早已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最为简明而经典的表述。可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做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使我们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外来的先进文化，都聚焦到了一个点上，那就是中国革命、中国建设或中国改革的“此在”性，坚决反对那种脱离现实的空洞和抽象。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了马克思主义的“过滤”和“筛选”，得到了扬弃和升华，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契机。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和因子激活了，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勃勃生机，充满活力，真正活在了当代中国人的观念和实践中。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过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解释学背景的诠释和发挥，实现了本土化和民族化，从而成为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沃土之中的“活的马克思主义”。毋宁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种“互化”或曰“双向奔赴”，正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成就。

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在两者结合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得以深化和拓展

写好“千年运河”的齐鲁新篇章

□ 丁延峰

近期，国家出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作出了明确部署。此前，山东省“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提出，“多元发展黄河文化、运河文化、泉水文化、海洋文化”，建设大运河南旺分水枢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承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厚重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加快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建设，对于我省加快建设经济文化强省具有重要意义。

活化传承、创新性发展

大运河山东段是大运河贯通南北的重要河段，沿线区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是运河文化资源的富集区。

近年来，山东省大力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倾力打造“鲁风运河”文化旅游品牌。台儿庄古城、微山湖湿地、聊城中华水上古城、泰安白佛山文化产业园等一批投资大、带动力强的项目已相继开工建设或营业；微山湖湿地古镇、水浒影视小镇、东平湖生态旅游小镇等一批运河文化特色小镇已颇具规模。

作为运河流经的重要区域和东部发达省份，山东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要确立定位，明确定位，梳理整合山东特有文化资源，挖掘山东大运河文化精神内涵。

科学合理的规划，既要注重跨地区跨部门协调，又要发挥文物和文化资源综合效应，凸显大运河文化属性和综合功能。要充分把握山东大运河文化时代特征，强化全球视野、中国高度、时代眼光。

将发展定位落到实处，需要坚持活化传承、创新性发展。在深入挖掘大运河(山东段)历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切实做好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要把山东大运河文化的思想理念、人文精神和文化特质与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让大运河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要坚持保护与利用的互促兼备，提升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突出大运河文化的合理化利用，突出公园建设的经济价值，使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山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缩小我省东西部发展差距，实现全省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

文旅融合、全域带动

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在文化资源挖掘、文化业态构建、文化品牌打造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大运河文化保护、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落实机制仍不够完善。建设管理主体仍不够明晰，各建设管理主体关注区域特色较多，协调沟通较少，存在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等情况。

运河文化挖掘仍不够深入。对运河文化多元价值体系和丰富文化内涵的挖掘与展示不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相对滞后，除了台儿庄古城成为文旅融合、全域旅游带动的典型之外，其他城市运河文化产业尚有待深入开发，各类文化资源活化利用形式和途径较为单一。

到影响；城乡建设挤占河湖生态空间，运河两岸部分文物古迹损毁严重，航运污染问题仍较突出，农村面源污染尚未得到彻底治理，河流水质稳定全面达标压力较大。

4种类型、6种模式

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突出“鲁风运河”文化特色，坚持规划先行，统筹考虑我省资源禀赋、人文历史、区位优势、市场需求，最大限度调动各方积极性，精心打造文化名片，实现共建共赢。我省在文化公园建设中，应按照“完善机制+突出重点+旅游支撑+科技引领+绿色发展”的推进路径，使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我省文旅融合示范带、西部地区旅游经济隆起带、彰显齐鲁风采的大运河文化带、具有国际示范意义的历史文化遗产廊道。

完善建设推进机制，推动运河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作用，实行“总体规划、统筹协调、整体保护、统一利用、共同推进”的管理运行模式，要组建山东大运河区域联盟，建立健全工作协同与信息共享机制，打造区域协同发展样板。要修订制定配套法规规章，严格规范和约束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相关行为，认真对接国家出台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将国家层面的战略统筹与山东省的落地实施有效结合。

突出规划建设重点，明确运河文化公园推进路径。深入梳理我省大运河文化资源，提炼与打造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4种类型、6种模式。一是结合国土空间规划，根据运河文物和文化资源等级，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划分为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4种类型。二是着力提炼协同共生模式(台儿庄古城)、旅游综合体模式(聊城中华水上古城)、活态博物馆模式(临清中洲运河古

从实质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文化原型上的契合关系。这种关系的具体表现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大概包括这几个方面：首先，中国文化固有的“天人合一”观念，强调人道顺应天道；这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及其统一，具有某种可通约性。其次，中国文化格外注重“践履”和“习行”，这种实践品格的凸显，构成一大特色；这与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唯物论”立场，把实践作为自己的哲学的原初范畴加以确认，也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再次，中国文化强调“知行合一”，反对脱离实际的空洞和玄虚之论，此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这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立场，也不无相合之处。还有，中国文化的“大同理想”规定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和愿景，这一理想内蕴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观念；这与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那种以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为目的的共产主义理想，同样存有某种类似之处。正是这种文化原型层面上的一致和契合，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会通的可能性。

历史的事实充分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正弘扬者、继承者，因为我们党对传统文化采取的是批判地继承的辩证态度，这也是唯一正确和科学的态度。当然，究竟如何恰当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需要因时因地制宜，决不能搞“一刀切”、“绝对化”，这正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论原则的要求和体现。

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因此，他特别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从现实意义来说，这样做，“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中国共产党人决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因此，毛泽东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强调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国家的历史、中国革命的历史和我们党的历史。

显然，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只能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因时因地制宜，不能抽象地超历史地去把握。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在当代世界日益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启示价值逐步得以凸显。所以，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成为新时代的必然诉求。在这一前提下，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乃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今天，我们要突出中国性，在全球化所造成的文化同质化趋势中，保持中国特质。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得以深化和拓展的内在要求。

(作者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更多内容，请扫码关注



山东深观察

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 周如东

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综合素质，是一个国家发展活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这一重要论述，既是对党百年来青年工作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也为未来青年成长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志气，即志向，表现为崇高的信仰、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骨气，即风骨，表现为刚强的人格、浩然正气和担当的操守；底气，即内生力，表现为自尊自强的信心和拼搏奋进的力量。志气、骨气、底气是一个人精神状态的集中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成长成才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多次强调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树立与时代主题同心同德的高远志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综合素质，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新时代中国青年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就是对理想信念、精神状态、综合素质等具体内涵的时代注解。

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是在总结青年成长历史经验基础上，对青年成长内在规律的揭示。青年学理经验表明：目标远大，意志坚定，方法正确是青年成长的内在主观条件。目标远大，就是要求青年树立起远大理想，具有鸿鹄志。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勉励广大青年学生要立志做大事，立志是一切开始的前提。他指出：“一个人在青年时代确立的正确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对自己成长和人生奋斗具有重要意义”。意志坚定，就是要求青年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都要做到顽强坚毅，刚直不屈。“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成功者不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靠坚强意志、铮铮的骨气，顽强拼搏出来的。方法正确，就是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正确方法。成才的正确方法有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读有字之书与读无字之书结合起来，向实践学习，向人民学习，“青年要成为国家栋梁之材，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

增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是当代中国对青年成长提出的时代要求。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新的征程上，我们会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矛盾和挑战，必须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面对这样的客观环境，青年一代要成长为对祖国和人民有用之材，树立起为祖国和人民永久奋斗、赤诚奉献的坚定理想，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明辨是非曲直，增强自我定力，致力不懈奋斗，不断增强“四个自信”，矢志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是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发展之路和前行方向。

有理想是青年成长的目标定位。志气、骨气、底气源于有理想。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钙”。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建党百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具有豪迈的志气、铮铮的骨气、厚实的底气，就是因为他们的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理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英勇奋斗，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用对理想追求的实际诠释了什么是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有本领是青年成长的搏击能量。志气、骨气、底气成于有本领。本领即能力和素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锤炼高尚品格，用一生来践行理想追求。对如何增强本领，他进一步强调，把远大志向变成现实，既要学得真学问，练就真本领，又要有锲而不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要锤炼坚强的意志和品格，培养勇于争先的进取精神，历练不怕失败的心理素质，保持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敢于面对各种困难和挫折，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飞扬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这些重要论述所包含的核心要义正是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的鲜明写照。

有担当是青年成才的价值体现。志气、骨气、底气始于有担当。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深刻理解把握时代潮流和国家需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的远大理想，履行起一代更比一代强的青春责任；要有锲而不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百折不挠的进取意志，保持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敢为人先，敢于突破，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要不断坚定“四个自信”，激发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奋进担当的内生动力，以聪明才智贡献国家，以开拓进取服务社会。概言之，有担当就是要求新时代中国青年在肩负时代重任时行胜于言，在攀登知识高峰中追求卓越，在真抓实干中成就事业，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作者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